学术动态

《清史研究》三十年

祁美琴

同许多社会科学刊物的诞生一样，《清史研究》(原名《清史研究通讯》) 也是与我国改革开放同龄的刊物。1979 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成都召开的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决定，为了加强清史研究，互通情报，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共同主办一个不定期的内部刊物《清史研究通讯》，自 1979 年起，相继刊印 12 期之后，1982 年 9 月改为正式期刊，在国内公开发行。出版 10 期以后，为了进一步推动全国的清史研究，扩大国内外的学术交流，经过有关部门核准，从 1985 年起扩大篇幅，由原来的 32 页增加为 64 页，由国内发行改为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从 1986 年起，《清史研究通讯》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独自主办。1991 年经国家教委和新闻出版署批准，《清史研究通讯》正式更名《清史研究》，从 1992 年起，版面由原来的 64 页扩展为 128 页，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书报资料中心合办，清史研究所承担编辑工作，书报资料中心负责出版和发行工作。从 2000 年开始，《清史研究》再次由清史研究所独办，学校在经费上予以扶持。清史纂修工程启动后，为适应研究需求，发挥学术阵地作用，为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和繁荣清史研究事业服务。本刊编辑部决定再次调整《清史研究》版面，从 2008 年起，《清史研究》从原来 128 页又扩展为 156 页。三十年来，《清史研究》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苦心经营下，由薄变厚，由一株幼苗成长为一颗挺拔向上的大树，用自己的坎坷历程见证了清史研究不断发展和繁荣的历史。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统治中国长达 268 年，其历史跨越了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型的重要的发展阶段，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当代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如经济建设、政治改革、文化发展、中外交往、人口、宗教、边疆、生态、城市化、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都需要追溯到清代去寻找根由。因此，清亡以后，清史研究受到大批的历史研究者的青睐，无数的学者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献给了清史研究事业。《清史研究》作为国内外清史研究领域惟一定期出版的刊物，作为展示清史工作者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学术成果的园地，感到无上的光荣。

三十年来，《清史研究》以推动清史研究的发展为己任，为了能够承载更多的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扩大篇幅，提高编辑和印刷水平。在老一辈清史学者的关心和爱护下，《清史研究》以其明确的专业特色和高品质的学术追求，赢得了清史学界的广泛认同。这里，我们就《清史研究》的学术定位、学术贡献、办刊经验几方面，做简单的回顾和总结。

一、学术定位

《清史研究》作为清史专业领域的学术期刊，在坚持自己的专业特色的同时，紧扣时代发展的脉搏，把握不同时期清史学科自身的发

[收稿日期] 2009- 05- 20
[作者简介] 祁美琴 (1964—)，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北京 100872

展需要，不断促进清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为清史研究的进步和繁荣做贡献。

1979年《清史研究通讯》创办之初，篇幅很有限，字数无多，主要的功能是交流情况，联系同行。1982年正式向国内发行后，《清史研究通讯》的中心任务是推动全国清史研究工作，交流研究心得，互通情报，为编纂大《清史》做准备。1982年第一期的首篇文章就是戴逸先生的《把大型〈清史〉的编写任务提到日程上来》，所以当时的内容侧重于介绍国内外清史研究动态、清史研究论著评介、专题讨论等，尤其是关于《清史》纂修体例的讨论、有关清史研究工作的批评和建议等。随后，由于国家经费紧张，重修清史的工作搁浅，《清史研究通讯》的内容开始转向具体的学术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尤其是1991年更名《清史研究》以后，刊物在恪守“学术性、资料性、信息性”相结合的办刊宗旨的同时，在栏目设置上扩展学术论文的容量，丰富常设栏目，内容涉及清代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学术、边疆民族、中外关系、读史札记、学术动态等，不定期推出热点专题、专栏，力求反映清史研究的主要趋势和研究课题。近年来尤其重视刊发选题新颖、观点有创新性以及挖掘新材料的优秀稿件和高质量的博士学位论文。

国家清史工程启动后，《清史》纂修再次成为清史学界的盛事，为适应新的学术组织和学术研究的需要，抓住清史纂修带来的清史学术繁荣的契机，适应不断发展的学术、编辑、出版需要，提升刊物的竞争力，2008年，我们推出了面貌一新的《清史研究》。在增加期刊版面的同时，就刊物的外观设计、栏目设置、主题内容等方面进行新的尝试。比如为提升刊物的影响力，为清史研究者提供和总结重要的研究成果的平台，活跃学术气氛，我们决定不定期推出“动态与评论”栏目，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积极参与和批评。与此同时，为了让全国的关心清史工程的朋友了解清史纂修的组织管理和项目进展情况，给广大的专家学者和项目主持人提供一个互相学习交流的阵地，从2008年开始，《清史研究》再次专辟“清史纂修”栏目，专门登载编纂委员会的有关情况和专家们的研究心得和体会，成为纂修清史的重要宣传阵地，再次肩负起《通讯》的功能。

总之，三十年来，《清史研究》作为清史学界的重要学术阵地，坚持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办刊方针，以促进清史研究的发展和繁荣为己任，以反应学科研究前沿为目标，以引领学科发展方向为动力，积极主动关注学术界的研究动态和研究热点，把握清史研究发展的脉搏，成为一份备受学界关注的沉稳、厚重、深刻、典雅的学术专业期刊。

二、学术贡献

1. 《清史研究》是清史工作者的学术殿堂

一个学术刊物，不仅肩负着知识传播和学术传承的责任，而且要不断思考自己的社会责任，历史使命。透过《清史研究》不同阶段刊登的文章，清史研究者可以了解过去三十年清史研究的学术发展和变迁，认识清史学科的发展趋势，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视野。自创刊至今的30年，《清史研究》共发表清史论文1300余篇，作者群几乎涵盖了清史学界的所有的精英，他们将自己在清史研究领域辛勤耕耘的成果奉献于此。《清史研究》的作者队伍，包括了三部分：老一辈的名家、大家，学术中坚和青年新秀。名家、大家既是学术界的旗帜，也是专业学术期刊的旗帜，我们需要名家引领，其中在本刊发表成果的清史学界德高望重的老一辈的名家、大家如季羡林、任继愈、王钟翰、罗尔纲、戴逸、李文海等。正是这些名家通过他们严谨学风和卓越的成就引领了三十年来清史学科的发展，也为《清史研究》撑起一片广阔的学术天空，《清史研究》因他们的名字而构筑了自己的辉煌。

学术发展更需要一大批中坚力量来支撑。今天，活跃在清史学界各个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大多在《清史研究》上刊发过他们的成名作或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他们是改革开放后与《清史研究》一同成长起来的一代学人，他们继承老一辈清史研究者的学术传统，在丰富和深化清史学科各个研究领域方面作出突出的贡献，成为今天纂修大型《清史》学术工程中的主力军。《清史研究》为能见证他们的成就而

自豪。

学科的发展，还需要众多青年才俊的加入，为研究队伍不断输送新鲜的血液。30年来，《清史研究》扶持了大量的中青年学者，为众多的青年学子及时展示自己的新视点、新收获提供了窗口。据初步的统计，在1998年至2008年的十一年间，全国各地的青年学者(包括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以及讲师）约有180余人次在《清史研究》发表了他们的成果，他们中许多人或者因此而坚定了自己的学术发展方向，或者因此而获得了所在单位的重视，走上了重要的学术岗位，《清史研究》不仅为这些学者的成长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也为清史学界培养了队伍。

此外，在《清史研究》的作者队伍中，还有一批外国的汉学家和清史专家。如美国的孔飞力、艾尔曼、何炳棣、罗威廉、柯娇燕、曾小平，日本的神田信夫、松浦章、沟口雄三、岸本美绪，以及法国的魏丕信、比利时的钟鸣旦、俄罗斯的B•C•米西斯尼科夫等，他们的学术成果，不仅使《清史研究》成为中外学术交流的窗口，也反映了《清史研究》在海外的影响力。

总之，从1982年创刊至2008年，《清史研究》的中国作者多达851人，外国作者65人。作者遍及海内外，覆盖了全国大多数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档案、图书馆、博物馆学科等研究领域。可以说，一部《清史研究》的发展史，也是几代清史学者为繁荣清史学术事业而奋斗的历史，是他们的汗水和成就熔铸成《清史研究》这座清史学界当之无愧的学术殿堂。

2.《清史研究》是清史学科发展的一面旗帜

作为登载清史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它的发展必然打上清史学术研究史的烙印。1982年，国家在制定“六五”规划中，第一次将社会科学列入发展规划，清史则作为断代史正式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研究项目。正是为了适应这一发展要求，《清史研究通讯》从不定期的内部工作参考读物改为正式面向国内清史学界发行的正式期刊。虽然之后《清史》纂修工程没有启动，但是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都是围绕《清史》做学术准备。这一点我们不仅可以从后来出版的《清代人物传稿》、《清史编年》、《清通鉴》、《清代通史》等著作体现出来，而且在当时的《清史研究通讯》中也有较为集中的反映。以1983年为例，仅《清代人物传》选载的文章就有5篇，其他涉及人物研究的文章也有10余篇，还有关于历史人物及清代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的讨论等。反映出当时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和围绕《清代人物传稿》所进行的工作。之后，随着《清代通史》工作的开展，有关明清之际的历史发展趋势及其康乾盛世的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从1984年、1985年的《通讯》第一期、第三期、第四期分别在头版发表了许曾重的《论康乾盛世的几个问题》(上、中、下）重头文章，反映学术研究和讨论的重点，也正是伴随着这种讨论和研究方向，《清史研究通讯》逐渐从工作刊物向学术研究期刊转变，学术文章开始涉及有清一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显示了清史研究向纵深发展。所以，从1986年开始，《清史研究通讯》围绕办刊宗旨，正式推出“学术论文”、“读史札记”、“文献与调查”、“清史研究评介”、“学术动态”五个固定栏目，标志着清史研究逐渐走向成熟。

这一时期，《清史研究》围绕清史学术界拓展研究领域和关注研究热点的需要，就一些重要的研究课题通过组织专刊、专栏方式，准确和及时反映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和重大历史问题。如这一时期推出的《清史研究》专号有:“清代边疆研究专号”(1988年第3期)、“康乾研究专号”(1989年第3期)、“清代边疆民族研究专号”(1991年第2期)、“中日甲午战争100周年研究专号”(1994年第4期)、“十八世纪中国与世界研究专号”(1995年第1期)、“清代社会史研究专号”(1997年第2期)、“清代边疆民族研究专号”(1998年第2期)。推出的“专栏”有“清代秘密宗教专栏”(1988年第1期)、“笔谈十八世纪中国与世界”、“李光地研究”(1993年第1期)、“纪念避暑山庄建园290周年”(1993年第2期)、“中英通使200周年”、“京港清史学术讨论会”、(1993年第3期)、“第七届全国清史学术讨论会专栏”、“浙东学术研究”(1994年第

2 期)、“洪承畴研讨会专栏”（1996 年第 3 期)、“施琅学术研究会专栏”（1997 年第 1 期)、“清前期文化学术研讨会专栏”（1997 年第 3 期)、“纪念戊戌变法 100 周年”（1998 年第 4 期）等等。这些专号和专栏登载的文章，大多是在研究项目和重要的学术会议的基础上产生的，如康乾盛世的研究、清代边疆开发研究、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甲午战争 100 周年、纪念戊戌变法 100 周年等内容，均是对这一时期清史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和重大课题的反映和总结。

1999 年为适应学术研究的不断细化和精深的状况，《清史研究》再次调整栏目设置，对原来的“学术论文”栏目进行更为细致的区分，每期根据刊发稿件的需求，设置不拘一格的栏目，紧跟清史研究向专深化趋势迈进的步伐。

新世纪之初春，《清史研究》以“面向 21 世纪的清史研究”为题，邀请清史学界名家戴逸、王钟翰、李文海、龚书铎、陈支平等先生，就新世纪清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和可能取得的成绩发表意见。在这里，戴逸先生再次预见性地指出:“易代修史”是中国人的传统，《清史稿》多可议之处，“我侪后来者当在前人的基础上，重加修撰，以竟其功，这是我对新世纪中清史研究的希望。现在距清朝之亡已有九十年，重新修撰编纂大型清史，此其时矣!”“我相信：21 世纪之中国必能完成此文化学术之伟业焉”。(《清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2001年，《清史研究》又推出“纂修清史”栏目，登载戴逸、李文海二先生《一代盛事，旷世巨典——关于大型清史的编纂》和季羡林、任继愈等专家《在〈清史〉编纂座谈会上的讲话》，以配合清史学界呼吁国家启动清史纂修工程。2002 年上半年，国家清史纂修工程还没有启动，《清史研究》第一期、第三期又辟“纂修清史”专栏，登载戴逸先生和陈其泰先生、秦国经先生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提供的文章，总结《清史稿》的经验和教训，探讨新修清史的体例问题以及目前档案资料的准备情况等。2002 年底，清史纂修工程正式启动，2003年，《清史研究》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均有“纂修清史”专栏，讨论新修清史的编纂体例等，如戴逸先生《在清史纂修体裁体例座谈会上的讲话》、李文海先生的《我们今天要纂修一部什么样的清史》等等。可以说，正是由于《清史研究》能够紧跟清史研究的时代步伐，从而也为见证清史学科的发展树立了一面旗帜。

3.《清史研究》是贯彻双百方针，活跃学术气氛的园地

《清史研究》自创刊以来，就密切关注清史学界的重大学术问题的讨论，适时推出相关的专号和专栏。如“义和团运动论坛”（2000 年第 4 期，义和团运动 100 周年)、戊戌变法、太平天国的“专题讨论”等等。欢迎开展学术争鸣和对话，如黄彰健的《康有为与戊戌变法——答汪荣祖先生》(1993 年第 4 期）就是对汪先生发表于《亚洲研究》（1992 年 8 月号）的批评文章的回应；又如王俊义先生的《庄存与复兴今文经学起因于“与和坤对应”说辨析——兼论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的吸收与借鉴》(2007 年第 1 期）则是与美国学者艾尔曼的对话。又如与戊戌变法研究密切相关的袁世凯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学术界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清史研究》于 1999 年第一期发表了戴逸先生的《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系》一文，引起学术界相关学者的一系列关注和回应，它们是房德邻的《戊戌政变之真相》(2000 年第 2 期)、郭卫东的《再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2002 年第 1 期）以及刘路生的《戊戌政变袁世凯初四告密说不能成立——兼与郭卫东先生商榷》（2005 年第 1 期)。这些文章不仅引起了学术界的共鸣，也为戊戌变法研究走向深入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鼓励学术争鸣的同时，也充分发挥舆论导向的作用，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的探索和具有学科指导意义的研究文章倾斜，如李文海的《对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的一点看法》（1997 年第 1 期)、苏双碧的《从多民族国家的角度评价爱国主义历史人物——为纪念施琅逝世 300 周年而写》(1997 年第 1 期)、祁龙威的《五十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条主要经验——实事求是》(2001 年第 3 期)、姜涛的《晚清史研究向何

处去》（2002年第2期）、王尔敏的《当代学者追求史学理论之芜滥》（2003年第4期）等等。通过这些文章，既宣传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也对相关问题的理论探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此外，编辑部还密切关注学术界召开的一些重大学术课题的研讨会。以“太平天国”的讨论为例，以“太平天国”的专题研讨会为契机，本刊于2007年第1期推出了章开沅先生的《从清史编纂看太平天国》和茅家琦先生的《走出14年（1850—1864）的思想束缚，以广阔的视角观察太平天国历史》等，该二文不仅为清史纂修解决相关的理论问题提出了标准，也廓清了学术界在相关研究中存在的偏差和混淆是非的观念。2008年4月，清史编委会为解决清代经济史研究中遇到的一些理论问题，召开了“清代经济宏观趋势与总体评价学术研讨会”，《清史研究》辟专栏登载吴承明、戴逸、方行等七位学者的报告，中国高教出版社创办的英文版《中国历史前沿》拟将该栏目文章全部翻译转载，向国外同行介绍，同期的《新华文摘》不但转载了戴逸、方行二位先生的文章，还同时转载了潘振平的《清史传记编写的几个问题》，一个刊物同一期有三篇文章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应该也是不多见的。在2008年第四期，《清史研究》以“热点关注”的方式，推出了戴逸先生的“光绪之死”及“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问题专项课题——清光绪帝死因研究”课题组历时五年、由五个单位的专家合作完成的“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戴逸先生的文章也被《新华文摘》和一些重要报刊转载。

与此同时，《清史研究》十分关注历史研究中方法论的讨论，如杨念群的《美国中国学研究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2000年第4期）、沟口雄三的《俯瞰中国近代的新视角》（2001年第1期）、钟鸣旦《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17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2006年第4期）、金观涛的《历史的真实性：试论数据库新方法在历史研究的应用》（2008年第1期）等等，这些文章虽为一家之言，但是对学界开阔学术视野、尝试新的研究方法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近年来，《清史研究》在国内外的影响越来越大，根据中国“知网”学术期刊评价统计分析平台提供的数据，在2005年至2008年的四年之中，《清史研究》所载文章的下载量逐年攀升，从2005年的18917次增加到2008年的52000次，总下载量达到121419次，总浏览量达113363次，为世界各地的清史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高品质的“清史盛宴”。可以说，正是由于顺应了清史学术发展的需要，才有《清史研究》的昨天和今天，也只有不断追求学术论文的高标准高要求，才有《清史研究》明天不断发展和不断创新的原动力。

4. 《清史研究》是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改革开放带来了历史学的春天，为了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尽快了解当时国内外清史研究的状况，改变已经落后的学术研究局面，《清史研究通讯》的创办者们，对《通讯》寄予厚望，把刊登“国内外清史研究动态”作为刊物的一项重要任务，可以说，从《清史研究通讯》创办之初，就将密切关注国外学术动态、组织刊登翻译的清史研究成果作为本刊的一大特色。如1979年第三期虽然只有薄薄的21页，就拿出12页来介绍美国的《清史问题》杂志，登载了从1965年创刊到1978年共计31期的目录，1980年第一期亦用大量的篇幅介绍美国、台湾清史书籍的出版情况，每期还辟专栏介绍国外的清史学家。1980年第三期开始连载的“清史研究在中国学发展中的地位和趋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提供）一文，重点介绍了美国、日本的中国学与清史研究的沿革、机构、学者和论著，1982年还出版“增刊”，专门登载1895—1981年间的“日本有关清史论文索引”。这些栏目和内容为改革开放之初的清史研究注入了活力，也为《清史研究》后来的学术定位奠定了基础。三十年来，《清史研究》在关注国外清史研究的学术成就的同时，也将一大批外国学者的清史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清史学界同仁。如（美）柯娇燕的“美国清前期研究的新趋势”（1988年第4期）、（美）何炳棣“捍卫汉化：驳伊芙琳•罗斯基之‘再观清代’”（2000年第1期、

第3期)、欧立德“清代满洲人的民族主体意识与满洲人的中国统治”(2002年第4期)等等，对中国的清史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目前，《清史研究》的文章也在美国的《史学文摘》及《美国：历史和生活》上登载摘要和索引。总之，外国学者通过《清史研究》展示了自己的专长和收获，国内学者则通过《清史研究》这个窗口，了解了国外清史研究动向，使自己的研究能够真正站在学科前沿的基础上向上攀升。

三、办刊经验

《清史研究》作为国内外清史研究领域惟一定期出版的学术刊物，自创刊以来，虽然在经费、人员投入上时有困顿，但是由于有人民大学的支持和清史研究所领导的重视，几代《清史研究》编辑部同仁的辛勤劳动和奉献，有国内外清史学界同行的信任和爱护，三十年来，《清史研究》才能够不间断出版和发行，并取得骄人的成绩。2001年，《清史研究》被评为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目前，《清史研究》已经成为《中国期刊网》、《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等多家数据库的来源期刊，在各种类型的核心期刊、国家级重点期刊、以及全国学者选出的最佳史学刊物的排名中，均名列前茅。刊物的印制数量从几百份增加到目前2500份，发行范围和发行数量逐年攀升，尤其在美国、日本、港、台等地区均有广泛的影响。多年来，我们还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清史论丛》编委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辑部、《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满族研究》编辑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历史档案》编辑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香港浸会大学《人文中国学报》编辑委员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文化杂志》编辑部、及美国的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清代史研究室满族史研究会、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部图书室等约50家国内外相关单位，建立了良好的交流合作关系，成为中国史学期刊战线的一名主力军。

《清史研究》能够取得这些成就，其原因可以归结于以下几点。

1、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和舆论导向。任何断代、国别和专门史的研究都离不开历史观，历史观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在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是非问题上，《清史研究》坚持讲政治，讲原则，坚持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既尊重历史事实，又要反映时代精神，鼓励学者们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勇于进行学术创新。

2、与时俱进，把握历史学科发展的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鼓励百花齐放，倡导学术自由，努力促进各种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的相互对话和相互补充，鼓励和引导清史学科的发展方向，始终把学术追求放在第一位，在商品经济冲击学术、侵蚀刊物的社会风气下，自觉坚守学术刊物的严肃性，不登载广告，不收取版面费，灵活掌握文章字数，对于学术含量高、确有研究且能解决一些学术疑难的文章，不限字数，以2008年为例，就有《清代泉州晋江沿海商人的乡族特征》、《清末新式学堂的伦理教育与伦理教科书探论》、《历史的真实性：试论数据库新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从“文质”之辨看清初帝王与士林思想的趋同与合流》、《从货币流通量看清代前期的经济增长与波动》、《近代中国早期的公司》、《在表格形式中的行政法典和刑法典》等3万字以上的学术论文7篇，其中最长的达6万余字。不仅如此，本刊在稿酬标准上亦向优秀稿件倾斜。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我们努力，能够使史学期刊兼顾史学论文的特点，为引领学界朝着做真学问的方向前进，鼓励有影响的专家和学者开辟新的学术领域和学术宗派，为净化学术风气添砖加瓦，为推动中国历史学科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3、适应时代和学术发展需要，在保持和办好特色栏目的同时，关注清史学科的研究现状，把握学术发展趋势，不断挖掘新的选题和文章。选题是刊物的生命力所在，要紧密结合当前清史研究的实际，密切围绕清史研究中的难点和空白点，进行选题。与学术界和清史工

程加强合作，充分发挥推动清史事业发展和文化繁荣的重要作用。中国人文科学的发展和创新要靠学术阵地来引领。近年来《清史研究》为确立在学术交流和学术互动中的主体地位，不仅密切关注学术界的国内外研究动向，还主动研究和了解学科走向，为一些有思想有创见的学者提供平台，为真正的学术创新提供宽松的环境和大胆的提携，不断扩大自己作为学术交流窗口和研究阵地的社会影响。

4、树立学术刊物的规范性和权威性，与国际接轨。从 1985 年起，《清史研究通讯》就在封底刊登本期文章的英文目录，从 1995 年开始，对于重要学术论文，同时登载英文摘要。随着国内电子期刊发行和学科评价体系的建立，《清史研究》紧跟学术期刊发展的脚步，在审稿方面实行匿名审稿制度，按照中国期刊数据库收录的有关标准进行版面的设计和调整，使《清史研究》无论从内容还是到形式，满足学界的需求，以学术品格吸引读者，扩大影响。

5、保持一支高素质、勇于奉献的编辑队伍。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查阅 1979 至 1981 年的《清史研究通讯》，编者为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清史研究室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我们看不到任何个人痕迹。1982 年正式创刊后，也只有责任编辑和执行编辑，直到 1986 年以后，才有主编。直至今日，《清史研究》仍然没有专人负责编辑部的日常工作，所有的工作，都是由清史研究所的一些老师们兼职完成的，但是这种兼职完全是义务的，因为在人民大学的教师考核体制中编辑业绩不能算在工作量之中。从这些老师身上，我们看到了清史研究所的教师们默默奉献的高尚品格，也为《清史研究》来之不易的今天倍感珍惜。今天，我们在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优良传统的同时，在讲求奉献的同时，还要力求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编辑队伍。目前，清史研究所中参与《清史研究》编辑部工作的老师共有 9 人，其中教授 6 人，副教授 2 人，讲师一人，全部具有博士学位，这恐怕是其他的专业学术期刊中不多见的。我们还聘请美国的步德茂教授担任本刊的英文摘要翻译工作。2008 年，为提升刊物的学术层次和学术地位，我们在所领导的支持下，调整充实编委会及编辑部的力量，增加国内外著名学者为特约编委，他们是李伯重、桑兵、罗威廉、岸本美绪。正是这样高水平的专家编辑队伍，为我们刊物的学术质量提供了保障。几十年来，他们不计报酬，不计得失，无私奉献。这里，我们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和清史研究所的历届领导对《清史研究》的关心和爱护，向为《清史研究》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历届编辑部的成员，为罗明、李鸿彬、郭成康、王政尧、李天恩等历任主编，为十余年来义务为本刊担任英文翻译的美国学者步德茂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最后，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清史研究》能够有今天的成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得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历史学各位同仁的热情的关心和支持。可以说，没有大家的支持和帮助，就没有清史研究所的今天，更没有《清史研究》的今天。因此，在我们回顾《清史研究》昨天和展望明天的时候，我谨代表《清史研究》编辑部，向中国史学会、向全国各地的历史学界的同仁、向清史研究界的朋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最真挚的感谢！(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李文海、郭成康、黄兴涛、吴孝英诸位老师的指导和帮助，特此致谢)